



南充：英烈鲜血浇灌的红色热土

■张志森 文 斌 梁冬荣

记 史

南充是一片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土地，这里英才辈出，人才荟萃。开国元勋朱德、民主革命家张澜、共和国大将罗瑞卿、“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张思德均出生在这里。南充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斗争中，先后有5万多名儿女参加红军，3.8万多名英烈血洒疆场。

鲜为人知的中共川北支部

随着五四运动影响的深入和新文化思想在南充的传播，马克思主义也逐步在南充传播开来。1921年9月，四川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王石木、嘱咐应聘到南充县立中学教学的张秀熟、袁诗尧等人开始建立川北据点。他们在张澜的支持下，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和读书会，组织师生阅读马克思主义书刊，指导学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在南充的早期传播者。

1922年秋，中国革命家、教育家、“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应张澜邀请，到南充宣传全川自治联合会的纲领、宗旨时，还先后到南充几所学校以“中国青年的曙光”为题，向师生介绍苏俄革命，宣讲列宁的主张，并举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讲座，鼓励师生努力学习新思想，以改造社会为己任。从此以后，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杨伯恺、石琼、任卓宣、刘剑南等，也经常给营山、顺庆、阆中的同学和亲友寄回旅欧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

组织办的《少年》《赤光》刊物和《唯物史观》等马列书刊。南充各地进步师生积极阅读《新青年》《中国青年》《新潮》《向导》《蜀报》《共产党问答》等报刊，还利用节假日以印小报、出壁报、贴标语、发传单等方式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并到茶楼、街头等公共场所发表演说，向群众传播革命思想，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南充的广泛传播，影响了一大批有志青年对人生信仰的选择，促使他们走上革命道路，从而为中共南充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创建准备了条件。

随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南充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纷纷回到国内，投身大革命洪流。杨伯恺、柏毅、吴季蟠、黄知风等在上海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后，参与了上海的工运、学运，亲身体验了国内火热的革命斗争。1925年秋，吴季蟠、黄知风接受组织的安排，回到南充、营山发展党组织，同时承担筹建国民党（左派）县党部、发展左派力量的任务。

1926年，吴季蟠、黄知风被驻防南充的川军第5师师长何光烈聘为部咨议官后，在驻军中秘密发展国民党左派力量，筹建国民党（左派）组织，先后将第9旅旅长秦汉三、第10旅旅长杜伯乾等一批中下层军官发展为国民党（左派）党员。与此同时，还在工人、学生、市民中发展了一批国民党（左派）党员。经过吴季蟠、黄知风等共产党人的辛勤工作，中共川北支部于10月前正式成立，吴季蟠、黄知风为支部负责人，直属中共重庆地委领导。

中共川北支部的建立，使南充人民有了自己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明确了奋斗目标和革命方向。从此，揭开了中国

共产党领导南充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新篇章。

顺泸起义和升钟寺起义

在南充市顺庆区西山风景区内，有一座“顺泸起义纪念碑”。这座纪念碑记录了1926年12月1日，为配合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在四川的泸州、顺庆（今南充）地区独立领导和策动部分四川军阀部队举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史称“打响巴蜀革命第一枪”的顺泸起义。

1926年7月，共产党人杨闇公、朱德、刘伯承、吴玉章等，准备在四川策动驻顺庆（南充）和泸州、合川的部分川军起义，打算以顺庆为根据地，集中三城起义军后，东向攻打绥定（今达县市）军阀刘厚厚，控制川东，以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保障北伐军的侧翼安全。

1926年9月28日，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在重庆秘密召集黄慕颜、秦汉三和倾向国民革命的师、旅长代表12人召开军事会议，着重商议了“响应北伐，会师武汉”事宜。会后，单独留下顺庆、合川、泸州的5位代表，布置起义行动方案，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刘伯承、黄慕颜担任正副总指挥。

11月中旬，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等在重庆浮图关下六店子刘伯承家召开紧急会议，成立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三人组成的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中共重庆地委委员书记杨闇公兼任军事委书记。

12月3日，顺庆驻军何光烈部秦汉三、杜伯乾打响了顺庆起义第一枪，把何光烈包围在师部。守敌惊慌失措，纵火焚烧了4条街，何光烈在混乱中化装潜逃。同日，黄慕颜在合川起义后将部队开往顺庆，刘伯承随军到达，起义军黄慕颜部及顺庆的秦汉三、杜伯乾三路在南充会师。

顺泸起义震惊了四川军阀，邓锡侯、刘文辉等调遣军队于12月13日分三路围攻顺庆。通过激烈战斗，因力量悬殊，加之泸州方面起义军未执行到顺庆会师的命令，顺庆起义军便在刘伯承总指挥带领下向北突围，撤离顺庆，顺泸起义宣告失败。

顺泸起义虽然失败，但意义重大。这是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中共重庆地委地方执委有计划、有组织发动的一次英勇的军事行动，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组织武装起义的一次重要尝试。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四川军阀割据日益严重。1931年冬，中共升钟区委成立升钟区农民协会，并在升钟寺、保城庙、皂角埡、观音场等地建立起乡、村农民协会，会员达5000人左右。



顺泸起义纪念碑。

向嘉陵江以西进攻，兵力部署及攻击目标，宜以苍溪、阆中、南部之线为主要方向”。红四方面军根据中央电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西进策应中央红军作战，实施西渡嘉陵江的计划。

3月28日晚，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打响。第30军第88师第268团从南充苍溪县塔子山神速渡江，建立了滩头阵地。29日拂晓，第88师后续两个团渡江投入战斗，攻占制高点。第31军从苍溪以北的鸳溪口强渡成功，一举攻占敌险要阵地火烧寺，击溃敌一个旅。第9军与第30军各一部从洞溪口顺利渡过嘉陵江。其余部队在嘉陵江北起红岩寺南至青牛庙50余公里的沿江渡口，实施了多路突破。

红军过江后，夺回被敌人抢走的大批船只，并在虎跳驿至洞溪口的江面架起数座浮桥，使红军大部得以迅速过江。4月2日，阆中解放。至此，红军控制了北起广元、南至南充南部县约200公里的嘉陵江西岸地区，历时24天的强渡嘉陵江战役胜利结束，打开了与中央红军会师北上的通道。红四方面军从南充境内的苍溪、阆中、仪陇、营山、蓬安等地集结，向西挺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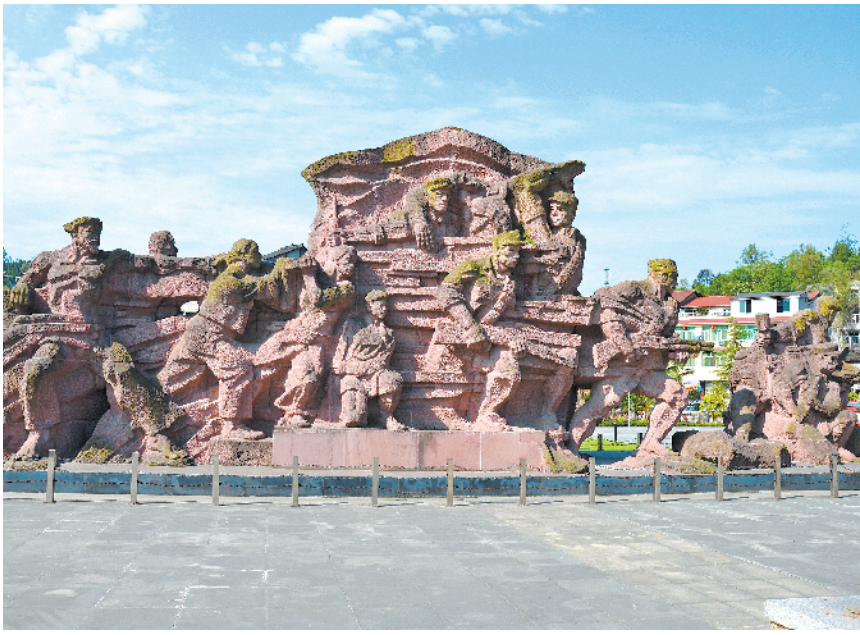
南充不仅是红四方面军长征的主要

出发地，还是红四方面军兵员的主要来源地。到1934年年底，红四方面军由最初的4个师、1.5万余人发展到5个军、15个师、8万多人，为红军员额补充发展壮大，巩固和发展川陕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巨大贡献。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南充光荣的革命斗争史启示我们，坚守革命的理想信念，无限忠诚于党和人民事业是开创革命新局面的精神支柱；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党和军队的根本制度和政治纪律，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力量源泉。光荣的南充革命史必将激励后来的人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程中始终秉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长征

第4982期



阆中市红军烈士纪念馆中的雕塑。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通信保障

■白雪岩

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6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连续进行5次战役，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回到“三八线”附近，稳定了朝鲜战局，迫使敌军接受停战谈判。在此期间，志愿军通信官兵发扬光荣传统，战胜通信装备落后、技术人员奇缺以及敌机狂轰滥炸等重重困难，浴血奋战，创造了许多独特的通信方法，完成了通信联络任务。

报话机打起了哑谜

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第40军第120师、第118师在云山东侧的玉女峰、两水洞及温井进行的战斗，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第一次战役，我军主要趁敌分兵冒进之际，集中主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制止敌进攻。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得知我第39军已经包围了进占云山的美骑兵第1师第5、第8团时，立即决定以第39军为主，歼灭美骑兵第1师为这次战役的主要任务。彭德怀认为，要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我其他军务必更加猛烈地攻击自己当面之敌，能歼灭的要坚决歼灭，歼灭不了的，也要紧紧地咬住敌人，使之不得增援云山。彭德怀向参谋长解方交代了他的意图，并令其迅速下达命令。

解方受命后，立即起草电报，但只写了几个字就搁笔了。战机稍纵即逝，这

样紧急的命令，用无线电报下达已经来不及了，而有电话又不通，解方决定亲自用短波报话机与各军指挥员通话。他对着话筒说：“我讲老吴他们的事，你们明白吗？”对方都回答说：“明白，请讲。”解方参谋长接着说：“他们的工作是主要的。你们务必做好自己的工作，能完成的要坚决完成，完不成的也不能放手，决不能给‘胖子’添麻烦。明白吗？”对方都回答：“明白，请放心！”完全用暗语说不明白，用明语又怕泄密，解方采用这种“打哑谜”的办法，用隐蔽的语言下达了彭德怀的命令。通信内容涉及部队番号时，就用“老吴”“老李”“胖子”等指挥员的姓名或“雅号”来代替，涉及地名时就用“离‘老吴’东面或者西面多少里”来代替，达到了番号及地名保密的目的。

命令下达完只用了几分钟。各军坚决执行这一命令，迅速发起猛攻，打了出师朝鲜的第一个大胜仗。

“隐身”直插 暗语传令

第一次战役后，志愿军通信官兵认识到无线电通信要提高时效及加强保密，必须充分完善无线电暗语通信。于是编制了新的暗语和代号，使密语内容从原来20多条增加到200多条。为了加强保密，在战术范围使用地名代号，在战役范围则采用地图坐标加密的办法，从而进一步完善了无

线电信号通信。

1950年11月27日，第二次战役的西线反击作战中，在德川、宁远之战获胜后，为乘势而上，尽快形成合围之势，彭德怀紧急电令第38军以主力向军隅里方向进攻，以一部向军隅里以南的三所里进攻，迂回堵击军隅里、价川逃敌。

从德川到三所里至少140华里，受领任务的第113师虽已人困马乏，却依旧急速前行。敌机频繁临空侦察，若按惯例走走藏或是昼伏夜出，便无法按时到达三所里。第113师决定利用部队深入敌纵深后方、敌机不易辨别敌我的条件，丢掉伪装，轻装前行。同时，为防止被美军无线电技术监听、暴露行军意图，遭到敌人围攻和轰炸，第113师关闭了电台，实施无线电通信静默。第113师日夜兼程，终于在28日晨赶到三所里地区，顺利完成了直插任务。

该师到达三所里地区后，立即架起无线电报话机与志愿军司令部电台联络。一接通，他们就向志愿军司令部发了3条暗语：“我师已进至三所里”“敌企图经三所里向南撤退”“请示我师任务”。彭德怀看到后，断定截断敌退路是这次战役获胜的关键，于是采取了越级指挥的果断措施，使用无线电通信向第113师下达命令：“要你部坚决截断敌退路”，整个联络过程不到5分钟。与该师联络结束后，志愿军司令部即与第38军军部沟通联络，通报了第113师

的情况，并要求军主力迅速向该师靠拢，通信联络也只用了几分钟。彭德怀对这次战役中通信联络保障很满意。解方在总结这次战役经验时说：“这次战役的胜利，从指挥意义上讲，无线电通信（又叫无线电暗语通信）起了重要作用。”

疾驰的“救火车”

在抗美援朝作战指挥中，有一种通信保障方式被形象地比作“救火车”式通信。所谓“救火车”式工作方法，即工作过程如同救火车在大街上奔跑，全线开绿灯，谁也不能阻拦。

1951年1月25日开始，敌人趁我军休整及补给困难之际，再次向中朝军队发起全线进攻。我军组成东西两线战役集团，东线由邓华副司令员指挥，于1951年2月11日开始实施战役反击。发起反击当天，彭德怀下定决心：拟令东线战役集团先打横城之敌，后打砥平里之敌。他要征求邓华的意见，而此时，志愿军司令部对下有线电话不通，无线电话因战役反击未打响不能使用，电报又长又急，按正常程序拍发来不及。于是，志愿军司令部通信处根据解方指示采用了“救火车”式工作方法来解决。从彭德怀发电，到邓华“同意彭总决心”的回电，整个过程未超过30分钟，保证了战役命令的及时下达。

埋地天线发出神奇电波

战略相持阶段，坑道发挥了巨大作用。当表面阵地被敌人占领，我军退守坑道时，通信联络主要靠步谈机，其最大困难是天线的架设问题。志愿军通信官兵创造了埋地天线，成功解决了这一问题。

1952年6月中旬，当敌人攻占我190.8高地阵地时，我第39军一个班的战斗人员被困在坑道内，后面部队以为坑道内没有我们的人，不准备夺取该阵地。退守坑道的这个班有1部步谈机，正当大家情绪低落，丧失突围的信心时，步谈机员徐福才沉着冷静地说：“大家不要急，我想办法与上面联络！”经过多次尝试，他将天线埋入地下，与外界恢复了联络。后面部队立即反击，依托坑道与敌反复争夺8昼夜，最终夺回阵地，救出被



1951年，朝鲜战场上，志愿军通信兵在一次反击战中，用报话机为炮兵指示射击目标。本版照片均由作者提供